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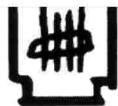
十 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 9 冊

《文選》選詩研究（上）

楊淑華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文選》選詩研究（上）／楊淑華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民99〕

目 4+156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編：第9冊）

ISBN：978-986-254-147-0（精裝）

1. 文選 2. 研究考訂

830.18

99001805

ISBN - 978-986-254-147-0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 編 第 九 冊

ISBN：978-986-254-147-0

《文選》選詩研究（上）

作 者 楊淑華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總 編 輯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0年3月

定 價 十編 20冊（精裝）新台幣 31,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文選》選詩研究（上）

楊淑華 著

作者簡介

楊淑華，台中師專語文組、臺灣師大國文系畢業。民國七十八至八十二年間就讀臺灣師大國文研究所碩士班，師事邱燮友教授，撰寫《文選選詩研究》；八十六至九十二年間就讀成功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師事張高評教授，撰成《方東樹《昭昧詹言》及其詩學定位》，現任國立台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副教授。另有《臺灣當代小說論評》（1999 春暉）《語文教學與應用》（排版中）等合著專書出版。

提 要

基於對傳統選集在文學批評意義上的疑惑，本論文針對《文選》詩卷進行選錄現象的統計與分析，探究其藉實際批評所呈現的詩歌評價與理論。

正文六章約依以下三個層次展開論述：

第一、二章先考辨全書之編纂時間、成員、選材與背景等選集基礎，以及版本異同、編輯體例等構成《文選》評論的客觀條件，以使時空的詮釋、材料的選用有較具體而清楚的立論點。

第三、四章則藉由選錄原則的釐析、詩篇選目的分析、選錄地位的比較、和歷代詩話評價的縱橫聯繫，以檢證學者對《文選》選詩現象的諸多批評是否屬實？比對《文選》選編者對於各詩家的評價與定位為何？

第五、六章則綜觀前述量化統計結果，配合詩篇內容分析與詩人其他創作、後代選集等比較，以評估《文選》所選詩篇於各家、各類詩中之代表性；並舉與同代《玉臺新詠》略作比較，彰顯《文選》詩卷之評論特色。而後，並統整前述各章所分析的選錄線索，結合序文、編者論述等文獻，將《文選》選詩所呈現的評論內涵歸納為詩歌原理、詩歌源流、詩歌體類、詩歌批評四個面向論述。

經此研究，可確定《文選》的評詩理論因立足當代、遵循時尚著重實用之傾向，而致評論之開創性不足、評選亦未能對後世發揮持續性影響。但回歸文學史應考察文學活動實象之目的考察，《文選》選詩實已充分反應齊梁當代評詩風尚與論詩觀點，並對後續唐代詩學產生具體影響，故雖無《文新雕龍》之論理、《詩品》之品藻，仍當為齊梁文論的主脈之一，在中國文學評論史中佔有更顯著、明確的地位。



目次

上 冊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一、《文選》之文學評論意義	1
二、「選詩」之研究價值	2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方法	3
一、研究目的及重點	3
二、研究方法及限制	4
第三節 《文選》之編纂基礎	5
一、結集時間	5
二、編纂成員	8
三、編纂材料	12
四、編纂素養	13
第四節 《文選》之編纂背景	15
一、位躋四科、卷盈緗帙	16
二、文集滋廣、類例日明	17
三、淄澠並泛、文理澄清	20
第二章 《文選》選詩之結構	25
前言：《文選》之版本研究	25

第一節 編選目的之推測	27
一、編集之目的	27
二、選詩之功用	29
第二節 詩篇編排之體例	31
一、編排體例之層次	31
二、分類原則之辨明	32
三、排序原則之釐清	42
四、內容呈現之格式	50
第三章 《文選》選詩之分析	57
第一節 詩篇選錄之原則	57
一、詩篇之選錄原則	58
二、詩篇之刪汰原則	66
第二節 詩篇選錄之統計	72
一、自作者時代分析	73
二、自作品數量分析	77
三、自作品句式分析	86
四、自作品類別分析	93
小 結	100
第四章 《文選》選錄詩家之地位	103
第一節 《文選》選詩之結果	103
一、同代各家選錄地位之比較	103
二、各類詩家選錄地位之比較	110
三、歷代名家選錄地位之比較	113
第二節 南朝詩評之趨勢	115
一、綜觀流變之詩評	116
二、詳析詩家之詩評	119
第三節 歷代詩話之抑揚	137
一、大體為歷代推崇者	137
二、以一類獨擅古今者	141
三、地位漸獲提昇者	144
四、評價略見貶抑者	149
小 結	154

下 冊

第五章 《文選》選錄詩篇之評價	157
第一節 入選各家詩篇輯全	157
第二節 於各家詩篇之代表性	172
一、詩選集之選定	172
二、各家詩篇於後代選集中之地位	175
三、表列結果綜觀	199
四、詩篇之研究	200
(一) 同題詩篇	201
(二) 同類詩篇	203
(三) 異類詩篇	205
第三節 於各類詩篇之代表性	210
一、依各類詩入選比例而較	211
(一) 入選比例較高之詩類	213
(二) 入選比例較低之詩類	219
二、依各類詩選錄地位而較	223
(一) 獨立成類之詩篇	223
(二) 一家專長之詩篇	226
第四節 《文選》與《玉臺新詠》之比較	232
一、《玉臺新詠》之編輯宗旨及體例	232
二、《文選》與《玉臺新詠》之選篇比較	236
小 結	246
第六章 《文選》選學之詩歌理論	249
第一節 詩歌之原理	251
一、詩之本質	252
二、詩之功能	255
第二節 詩歌之源流	258
一、詩之起源	258
二、詩之流變	261
第三節 詩歌之體類	267
一、詩之範疇	267
二、詩之體製	270
三、詩之分類	276

第四節 詩歌之批評	281
一、選詩實際	282
二、評詩理論	290
小 結	297
第七章 結 論	299
主要參考及引用書目	303
附 錄	313
附錄一：昭明太子及東宮文士活動年表	313
附錄二：《文選》助編人員之文學素養、編纂經驗概觀	318
附錄三：現存《文選》各主要版本概覽	321
附錄四：《文選》選入各家詩篇輯全分類詳表	326
書 影	
書影一：宋淳熙尤刊本李善注《文選》卷目格式	373
書影二：宋淳熙尤刊本李善注《文選》總目格式	374
書影三：韓國章閣本五臣并李善注《文選》書前附〈文選序〉及國子監准奏文	374
書影四：韓國章奎閣本五臣并李善注《文選》書後附沈嚴〈五臣本後序〉及李善注校勘、雕造人員	375
書影五：韓國章奎閣本五臣并李善注《文選》書後附秀州州學編注六家注《文選》作法及卞季良跋文	376
書影六：宋紹興陳八郎宅刊本五臣注《文選》書前附近人王同愈，吳清之手書長跋、題記、及名家收藏印	377
書影七：宋紹興陳八郎宅刊本五臣注《文選》總目格式	377
書影八：宋紹興陳八郎宅刊本五臣注《文選》卷目格式	378
書影九：宋贛州州學刊本六臣注《文選》五十二卷書前有近人莫棠、宗舜年、王秉恩手書題識	378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一、《文選》之文學評論意義

《文選》，梁、蕭統撰，為現存最早之文學「總集」。^{〔註1〕}在眾多「總集」中，實佔有承先啓後之關鍵地位，在「文學評論史」^{〔註2〕}上亦為深具開發價值之研究題材，然因其未提出具體之評論準則，故易為中國文學批評研究者所忽略。

以《文選》編纂之形式歸類，當屬史志著錄中之「總集」類。「總集」之名，雖始定於梁·阮孝緒《七錄》，^{〔註3〕}溯其源流，則萌發出《詩經》、草創於《楚辭》、規模見於《文章流別》，體制之完備則推《文選》為先。^{〔註4〕}《文

〔註1〕 此「總集」，乃指傳統圖書目錄學上與「別集」對稱之總集。以今日觀點而論，「楚辭」、「詩經」似亦為總集。但自《隋書·經籍志》以下，集部，即區分為「楚辭」、「總集」、「別集」。後世多沿之，故《楚辭》不在前文論列。而《詩經》自漢以來即入經學之林，故不予並論。

〔註2〕 近代討論文學問題、評釋文學作家與作品之著作通常稱為「文學批評」，乃由西方 Literary Criticism 一文翻譯沿用。但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緒論》中，即有改以「文學評論」之議（見8～10頁）；楊松年《中國文學評論史編寫問題論析·緒論》更由論著史實、詞義、等方向析其改用之理，今沿用之。

〔註3〕 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卷三，收阮孝緒《七錄序·目》曰：「文集錄第三曰總集部、十六種。」故阮書雖佚，仍可見「總集」之源用。劉師培《論文雜記》亦曰：「文集之稱，始於梁阮孝緒《七錄》。」

〔註4〕 參見張滌華《古代詩文總集選介》，《國文天地》雜誌社七十九年出版，第1～14頁「緒言」所論總集源流。

選》能成為總集發展之標竿者，固由其保存完整、編旨體例明確可循，尤因其特著「選文」之文學評論特質。

由六朝文論輯佚所見，《文選》前之《文章流別集》諸作，雖已顯示所錄以「文章」為主之傾向，然其選材仍不避經籍。^{〔註5〕}至《文選》乃詳序其不錄經史子書之例（參見〈文選序〉），「文學總集」之質性因得以突顯。《隋書·經籍志·序》謂總集之緣出曰：「總集者，以建安之後，辭賦轉繁，眾家之集，日以滋廣。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於是採摭孔翠，芟剪繁蕪。」可見「總集」原本即為刪汰繁蕪、彙集菁華之選集，具有文學批評之功用。而《文選》獨以「選」題名，^{〔註6〕}其彙集眾製，略蕪存菁之選旨，格外鮮明。觀其序言闡論、體例標明、編纂結構，與近世「文學批評」呈現觀念、論述原理、指摘疵病、頌揚美好、研考作家諸端等批評特質，頗相契合。歷來之「選學」研究，多偏向注釋、校勘之學，辭彙、評論之功則較為罕見，以文學選集之觀點，研析其在文學評論上之價值者，尤為難得。故於現今中國文學評論史之研究論著中，僅有羅根澤、方孝岳等少數學者稍論及之，^{〔註7〕}然其篇幅甚少，故評析亦未易深入，僅撮舉《文選·序》之觀點反覆推闡，實有待精研原典後，加之以充實理論內容，方克提振文論之地位。

二、「選詩」之研究價值

基於對《文選》文學評論意義之肯定，擇取《文選》中詩卷為實踐理念之初步研究，乃因其本身即深富特色，具備獨立研究之優勢。

《文選》選錄詩篇四百四十二首，^{〔註8〕}涵括周、漢、魏晉以下七代，共

〔註5〕由《全晉文》中所存摯虞《文章流別論》佚文所見，有曰：「惟諫無定制，故作者多異焉。見於典籍者，《左傳》有魯哀公為孔子誅」，可見其所集不避經籍所錄。

〔註6〕清·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序曰「總集自晉有之，而無以選名者，梁·昭明太子采自周訖梁百三十餘家之文為《文選》，至唐而盛行」（廣文書局，民國五十五年版）。今察見史志著錄，以「選」為總集之名者，確始於蕭統。

〔註7〕參見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三篇第一章（學海書局，民國79年再版），朱東潤《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緒言》及第十四節（臺灣開明，民國49年台一版），方孝岳《中國文學批評·導言》及第十五節（莊嚴出版社，民國70年），周勛初《中國文學批評小史》第十三篇「文藝編輯家蕭統」（嵩高書社，民國74年）。

〔註8〕以明州本、贛州本《文選》卷十九～三十一所錄詩篇合計，本為四百四十三首，但卷二十七樂府「君子行」下註曰：「毚有三調，平調、清調、側調，此

六十餘家作品，可謂集古體詩之英華。而此「古體」詩，相對於晚出之唐代「近體」，同為中國古典詩之兩大類別，於詩體發展上自成階段，地位顯著：處先秦《風》、《騷》，隋唐律、絕間，呈現詩歌形式、格律之演變關鍵，其銜接地位不可或缺；與唐詩同為當代文學主流，各具風貌，俱為宋元明清後代詩所取資取法，其源頭地位不容替代。此乃其詩體發展上特色之一。

《文選》所錄詩篇，雖以周漢以降歷代古體詩為蒐羅範圍，然其彙集本經刪汰拙劣、芟剪繁蕪之淬選，且為梁代人以其詩學觀點進行評價、篩選。故由此結果之呈現，適足以反映選編者之詩學評論。且其評論中既寓有蕭統等個人之詩學理念，亦融入齊梁時代之評詩觀點。於詩學評論上亦有其獨特之研究價值，此為特色之二。

再就《文選》全書結構而言，係以「次文之體，各以彙聚」之分類編排為總則，且每體中「又以類分」，並「各以時代相次」，皆自成起迄，足以獨立，而其編排體例，分類架構，則全體一致，可相互參照。將其中蒐錄作品、作家最廣之「詩」體，作單一之題材，非但於《文選》全書頗具代表性，且為進退得宜之研究，此乃特色之三。

備此諸多特點，遂使《文選》詩卷成為學者關懷之焦點。宋明以來研究者頗眾，「選詩」之名，相沿而定。^{〔註9〕}然前賢心力，多集中於注釋、集評方面，針對選入材料本身（詩篇）進行釋義、鑑賞，故其所謂「選詩」其實為一集合性名詞，用以標明其研究對象。本文則側重詩學評論之角度，將「選詩」視為一完整之詩選，研析其選錄趨向、評詩理念，故兼及「選」詩之動態義，名曰：「《文選》選詩研究」。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目的及重點

本論文旨在探究詩選集之評論功用。故將《文選》中的詩，配合序言、

曲處於平調。善本無此一篇。」故捨此，共計四百四十二篇。

〔註9〕今見駱鴻凱《文選學》書後所附「選學書著錄」以「選詩」命名者即見六家，始於宋，多明清之作：宋·高似孫《選詩句圖》一卷；明·劉履《選詩補注》八卷；明·林兆珂《選詩約注》十二卷；明·凌濛初《合評選詩》七卷；清·吳湛《選詩定論》十八卷；清·鍾駕鰲《選詩偶箋》八卷。

體例，視為一獨立完整之詩選結構，經由詩篇統計、詩話評論、作品賞鑑等分析方式，綜觀《文選》選詩如何呈現選編者之詩學理念，具何種詩學評論之內涵，衡諸當代詩論之異同，並探究其於中國詩學評論史之價值。全篇共七章、分四層次討論：

第一層次：在確定研究對象及方向。故以首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範圍，揭示研究主旨與脈絡。並以「編纂基礎」之外緣研究，釐清《文選》選詩之核心人物、編輯條件，以瞭解當代評選之文學環境與思想背景。

第二層次：在建立分析研究之基礎。第二章「選詩之結構」先藉善本版本，作為研究之擇取，進而分析《文選》編纂目的、選詩體例、編排及分類特色；第三章「選詩之統計」則藉數量統計之研究方法，普遍而客觀地剖析《文選》詩篇之選錄趨向，作為深層研究之指標。

第三層次：進行選詩結果之評估。第四章「詩家之地位」乃以人為單位，詳析《文選》詩卷中各代詩家所佔選錄地位之高下，並與南朝詩評、歷代詩話比較，見其評論之沿襲性與影響力；第五章「詩篇之評價」則以入選詩篇為對象，經選本輯錄、詩話評價、作品賞析之檢試，評估《文選》選詩之代表性，並與《玉臺新詠》互相比較以顯出其特色。

第四層次：則為理論體系之構成與評價。第六章「詩歌理論」係綜合前四章研究所得，歸納而成之條理，並與當代詩論粗較異同。第七章「結論」：一則由選詩之成就，觀察《文選》對唐代詩學、後代詩選之影響；一則由詩論價值嘗試為《文選》在詩學評論史上定位。

二、研究方法及限制

本文主要針對《文選》選詩內容進行分析研究。因研究對象——「選詩」純為文學作品，且規模宏大，故兼採定質分析、定量分析兩種方式，以期充分掌握研究對象之特質：

鑑於數量統計、列表比對具有簡明、客觀之優點，故在控制變因、簡化分析因素之情境下，將「選詩」全體篇目予以歸類統計、排表詳析，以瞭解其編排結構及選錄趨向，是採普遍而量化之宏觀，顯明「選詩」選錄之整體特色，並得見堪稱典型之詩壇精英與未獲青睞之特例；徵諸詩家評論、詩選著錄，進而擇取詩篇品鑑賞析，則採鑑賞、評析之作法，發掘詩篇風格之體勢、創作之成就，由質的層次深入評析，一則對《文選》選詩之結果進行評價之再評估，

一則藉以衡較《文選》評詩之獨特觀點，擬構選編者詩學評論之體系。如此，由博返約、計量析質，期能適得二種研究方法之長，而互補其短。

此外，於詩論評析中並酌採比較方法，與歷代詩話、南朝詩論作縱橫之聯繫，藉以轉換研究觀點、擴充評論視野，較客觀地剖析《文選》詩學評論中沿襲成說、開創新論之處，以見其承先啓後之成分。

然而，以本論文之研究題材區分，本屬詩學評論史之範圍，故於選者考證、編纂背景、詩篇輯全、版本研究等研究基礎之確立上，仍須藉助蒐羅典籍、考訂文獻等歷史研究之方法，以選彙資料、提出觀念。但歷史研究基於時空疏隔、文籍散佚等因素，仍有其未能完整、難免主觀之限制，〔註 10〕故本文於引用資料之初，力求慎重，將《文選》版本之沿革作一釐清、辨明；並於統計詩篇之始，期其周全，蒐羅入選詩家篇章以輯全；引見詩文，則親校贛州州學刊六臣注，與陳八郎宅刊五臣注善本，以求真確。〔註 11〕然所得《文選》善本、眾家詩篇、歷代詩評、諸家選本，仍僅為寶山崩餘，雖嘆其殘零不整、唯恐專斷，在旁無可考之情況下，亦僅能暫以為論，並期學精識博之士，惠予指正。

第三節 《文選》之編纂基礎

一、結集時間

《文選》一書之編纂時年，《梁書》、《南史》、《隋書》等史傳資料均未見確載，致學者分引證據、推論不一。僅以《文選》書中確切之線索為主，編者（蕭統、劉孝綽等）之線索為輔，擇前賢合理之論據為佐證，如屬想當然耳之推論過當者，在未能辨其繆譌前，僅聊備一說。

首先，自〈文選序〉之內容，可約略畫定《文選》結集時間之上下限。編者自序其編纂之緣由：

余監撫餘閒，居多暇日，歷觀文苑，泛覽辭林，未嘗不心遊目想，

〔註 10〕參見王文科：《教育研究法》中「歷史研究法」一節，第 277 頁（五南圖書，民國 79 年）。

〔註 11〕由台灣現存《文選》善本而言，贛州州學刊六臣注與陳八郎宅刊五臣注《文選》雖非唯一之善本，但其所存詩卷（卷十九～三十一）較為完整，且為現存有真本可校者，故僅以此為準。遇詩文有出入時，則以案注李善本者為先、次依五臣本、再依六臣本，以符《文選》刊刻注疏之次第。

移晷忘倦。(〈文選序〉)

參照《梁書》昭明太子本傳所載錄，其於天監十四年（西元 515 年）受冠於太極殿後，即與聞庶政。至中大通三年（西元 531 年）寢疾而薨。^{〔註 12〕}此十餘年間，乃《文選》編集時間最寬泛、亦是最確切之上下限，凡編年之定，必以此為基本。

自何融以降，學者推論《文選》編纂時期者，多據選錄作品年代、作者卒年擬測，並參考東宮文士之盛衰，而將期限縮小為：天監十五年（劉峻寫作《辨命論》）後，至普通三、四年（東宮文士繁盛），而於普通七年（陸倕卒年）後始完成。^{〔註 13〕}此說主要立論於《文選》本身作品、作者之線索，論證詳切有力，然其循「不錄生存」為體例以作者卒年為斷限之說，雖獲學者共識，卻未能周延，^{〔註 14〕}乃待輔證強化之。今見蕭統〈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一文所曰：

得疏，知須《詩苑英華》及諸文製。發函伸紙，閱覽無遺。

其書論文學之事甚多，卻僅評文集、《詩苑英華》二書。據現存資料考索，《文選》收錄材料、範圍顯然較《詩苑英華》豐贍，而蕭繹、蕭統信中均未稍及之，或因此時《文選》尚未成書之故。^{〔註 15〕}參照劉孝綽〈昭明太子集序〉

〔註 12〕參《梁書》卷八〈昭明太子傳〉與《南史》卷五十三〈梁武帝諸子傳〉所載，曰：「太子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太子明於庶事，纖毫必曉，每所奏有謬誤及巧妄，皆即就辯析，示其可否。三年三月，寢疾，恐貽高祖憂，敕參問，輒自力手書啓……四月乙巳薨，時年三十一。」按：故可知昭明太子自加元服後即助理萬機、監攝國事，至中大通三年寢疾身故而止。

〔註 13〕參見何融〈《文選》編撰時期及編者考略〉收入學生書局版《昭明太子和他的文選》一書。林聰明《昭明文選研究初稿》第一章（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75 年 11 月初版）。顏智英撰《昭明文選與玉臺新詠之比較研究》，師大國研所碩士班，民國 80 年論文。

〔註 14〕《文選》以「不錄生存」體例選錄作品之說，始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二，引賈常一段，此後學者多據《文心雕龍》、《詩品》等文論之例，以其為梁代編輯通行體例，謂《文選》遵行之。並據此推測《文選》未錄某家作品，即表示其成書於某人卒年之前。其實，自收錄作品，編輯體例等種種跡象考察，《文選》雖大體襲《文章流別集》不錄生存之例，仍未有確切之論證足以驗之。且由今存《玉臺新詠》之編排及《顏氏家訓·文章篇》載錄劉孝綽《詩苑》止取何遜詩二首。亦可見當代仍有不避嫌隙，選錄生存之例子。故不宜過度推論以為眾書皆然。甚至作為另一項推測編輯時代，解釋未錄作品之主證，此皆不盡合理，使論據略嫌薄弱。

〔註 15〕參見曹道衡、沈玉成〈有關《文選》編纂中幾個問題的擬測〉一文，見《昭

所述推測，太子文集約成於普通三年（西元 522 年），〔註 16〕據湘東王出守荊州之時間推測，本書函當不早於普通七年（名元 526 年）十月作，〔註 17〕故可輔成前賢以作者卒年推論《文選》成於普通七年後之說。

然細考普通七年間之諸記事（參見附錄一），則《文選》之成書時間似應延後。由《梁書·昭明太子傳》載錄普通七年十一月庚辰，丁貴嬪（太子生母）薨。距湘東王遷守（普通七年十月辛未）、手足書信往返之時甚近，幾無定稿結集之可能。且太子秉性仁孝，方貴嬪有疾之時，即還永福省侍疾，及薨，哭輒痛絕，水漿不入口（參見《梁書》本傳）。故由此至中大通初年之喪制期間，〔註 18〕成書撰序之可能性極低；另由頗受太子禮重，獨與撰集之劉孝綽而言，普通六年為到洽彈劾免職，至大通元年（西元 527 年）正月乃因「籍田詩」起官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後復為太子僕。〔註 19〕而中大通元年（西元 529 年），即丁母憂去職。〔註 20〕故推重劉孝綽於《文選》編纂工

明文選研究論文集》第 39～45 頁。清水凱夫〈文選編輯的周圍〉一文，同見《昭明文選研究論文集》17～23 頁。顏智英《昭明文選與玉臺新詠之比較》一書第一章。以上三篇論文均引蕭統答書作為《文選》時尚未成集之論證。

〔註 16〕參見劉孝綽〈昭明太子集序〉一文，有曰：「粵我大梁之二十載，盛德備乎東朝……」考梁立國第二十一載，乃普通三年，故或以此序此集作於斯年。

〔註 17〕據《梁書》卷一〈武帝本紀〉及卷五〈元帝本紀〉載：普通七年冬十月辛未，出為使持節、都督荆、湘、郢、益、寧、南梁六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前此則繹在建康，即或書東往來，亦無須如此長篇議論，故註 15 所引曹道衡、沈玉成之論文則據此論證，謂「蕭統給蕭繹的信，不知作于何年，但最早當在普通七年後。」

〔註 18〕考察《梁書》、《南史》均無〈禮樂志〉，而《隋書》卷八〈禮儀志〉則載沈洙之議，論服喪宜以再周二十五月為斷，並引溯宋齊禮制曰：「所以宋元嘉立義，心喪以二十五月為限。大明中，王皇后父喪，又申明其制。齊建元中，太子穆妃喪，亦同用此禮。惟王儉《古今集記》云，心制終二十七月。又為王遜所難。何佟之《儀註》用二十五月而除。」並未明言梁制為何。而清水凱夫〈文選編輯的周圍〉一文則以梁代服喪期為二十七個月推算，未知其依據。曹道衡、沈玉成之論文，則曰：「古人所謂三年之喪，事實上是二年零七十天或二年零九十天。」其亦兼採二十五月及二十七月二說，故此處仍沿此二說，未予定執。

〔註 19〕參見《梁書》三十三〈劉孝綽傳〉：「及高祖為籍田詩，又使勉先示孝綽。時奉詔作者數十人，高祖以孝綽尤工，即日有敕，起為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后為太子僕，母憂去職。」又見《隋書》卷七〈禮儀志〉二：「梁初籍田，依宋、齊，以正月用詩，不齋不祭。」可知劉孝綽免官後，至遲至大通元年正月已復任湘東王諮議。

〔註 20〕參見《梁書·劉潛傳》：「晉安王出鎮襄陽，引為安北功曹史，以母憂去職。」

作之影響力者，多謂《文選》成於大通元——中大通元年間。^{〔註21〕}將此二線索參照權衡，則如《文選》之序文果為昭明太子蕭統親撰，而劉孝綽在實際編輯上亦佔有不可或缺之地位，則推定《文選》於梁武帝中大通元年（西元529年）前後進書，似是較為合理的。

有關《文選》成書時間之考定，雖未敢遽為定論，然由此一定點之暫擬，則大抵可知：《文選》乃昭明太子英年時期（年二十八～三十一）文學觀念成熟之選集，對其詩學評論之實踐，應具鮮明之代表性；《文選》之積極編纂時期，雖只在大通——中大通初年之三、四年間，實應視為《詩苑英華》、《正言》等各體選集之修改與擴充，可謂集天監年間以來，太子與東宮諸士討論篇章、商榷古今、編述等文學評論觀念之大成。

二、編纂成員

選集之成敗，編纂人員乃主其關鍵：編者之學理素養決定選集之趨向；編者之批評鑒識影響選集之品質；編者之數量多寡、態度公私則直接關涉選集呈現之嚴密性。仰觀前賢對《文選》編者之論述，難免兩極化之傾向，或過於寬泛地網羅史傳資料，臚列東宮文士名號、概述文學評論，或專斷直指為劉孝綽個人主導，再予蒐證佐成，一旦回歸《文選》本身驗核，皆不難見其偏繆：《文選》選輯歷代詩文，自謂「時更七代、數逾千祀……名溢於縹囊……卷盈於緗帙」（〈文選序〉），則品選範圍與編纂規模之大，必非少數學者獨力可成。而《文選》成書雖迭經學士討論，折衷諸家評論、綜賅前集精要，其積極專力之著手編纂，卻僅在大通——中大通年間，評選觀點或容承襲斟酌乎師友、實際參與編輯工作者則應以此為限。

傳統之《文選》編纂研究肯定編者多寡對纂集之便利，故據史載東宮文士之詳略，推測《文選》編纂結集之年代，看似詳切，實不免論證上之危機。^{〔註22〕}由前文考辨可知：大通——中大通年間《文選》的編纂，實則為統整、

王立為皇太子，孝儀服闋，仍補洗馬，遷中舍人。」考〈簡文本紀〉，其立為太子乃在中大通三年七月，據註18考見之喪制推測，則劉孝儀、孝綽丁母憂去職，當在中大通元年。

〔註21〕參見清水凱夫〈文選編輯的周圍〉一文第五部分（見《六朝文學論文集》重慶出版社），曹道衡、沈玉成〈有關《文選》編纂中幾個問題的擬測〉一文第二部分（見《昭明文選研究論文集》第33～34頁）。

〔註22〕按《梁書》、《南史》等紀傳體之史書，本以人物為主，須分由各人傳記綴綴東宮文士活動之片斷，故其所記多寡未必得當代活動之全貌；即史傳已錄繁